

人学视域下正确处理技术理性的路径探析

王婧雯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 中国社会目前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争论越发激烈, 对于技术理性的反思也开始觉醒。在这一基础上, 研究当代中国技术理性和由此带来的问题, 可以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警示。本文通过对中国社会具体现象和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剖析出技术理性一味张扬和放任人的占有欲望和控制能力的负面影响, 从而进行反思, 提出相应对策, 以有效抵制技术理性所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技术理性; 技术伦理; 道德物化; 科学技术; 生活世界殖民化

一、技术理性的内涵及发展

技术理性源于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 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 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 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 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 技术和理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衡量方式。马尔库塞集中表现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 它认为技术已经成了新的统治方式, 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渗透到人的生活中, 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理性被逐渐消解, 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不再进行理性反思, 反而控制了人, 使人成了被动接受社会的“单向度”的人, 从而提出了技术理性这一观点。而如今, 随着技术的发展, 中国社会被技术理性所影响的现象越来越多。

二、技术理性带来的现实问题和原因分析

技术理性在过去确实推动了中国的发展, 隐形的各类问题也被掩盖。但是技术理性在今天的中国影响越来越深入, 不得不重视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各项问题。

1. 技术理性的泛滥导致思维方式的单向化

近几年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目共睹, 但同时一些科技成果使得科学技术站在了舆论潮头: 大肆鼓吹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技术突破、快手抖音的短视频浪潮席卷人群, 开启了人人自媒体时代、大数据库的争相建立与应用, 导致“数字利维坦”风险浮现等, 使得人们对于现实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单项式和机械化思维模式, 只看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便利和快捷, 忽视了技术背后的价值悖论: 基因编辑是否具有副作用、实验婴儿的采用过程是否合理、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人性化; 短视频中是否存在不良价值观念宣传泛滥、是否有甄别筛选的功能; 大数据的运用, 在疫情防控中确实取得了突出成效, 在各方面的的确确方便了人的生活, 但大数据是否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是否存在用于商业信息贩卖的行为等等。这种问题的背后是技术理性消解价值理性的趋势。

而产生这一趋势的原因是, 在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下, 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革新比以往时代更快、更迅速、更有成效的推动社会进步。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不再成为技术考虑的因素之列。因此, 人的思维在这种条件下变为了一种服务于实用目的物, 变成了工具。这样的思想不再具有否定性和批判性, 不再具有价值理性的判断。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写道: “正是技术的合理性, 掩盖了社会发展的不合理性。”^[1] 中国正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 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的核心的位置, 创新思维也在逐步运用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来, 如何避免技术理性影响国家全局发展,

是中国正面临的一大考验。

2. 技术理性的渗透导致行为方式的功利化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时代, 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技术理性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其中哈贝马斯在 20 世纪晚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时, 观察到技术理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生活世界殖民化。他将生活世界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公共领域中的规则是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 而私人领域的规则只是个人需要遵守并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 随着技术的发展, 公共领域的规则也渗透到了私人领域的层次, 而技术则借此通过货币和权力两种途径控制了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交往, 以经济和政治为手段的技术控制, 导致了生活世界被技术所殖民化^[2]。

反观现代中国社会, 也同样出现了这种现象。现代社会技术的广泛运用, 层出不穷的 app 导致的垃圾广告泛滥现象; 大数据时代面临着个人隐私安全、企业信息安全等问题^[3]; 博人眼球的视频大量流向市场导致对流量至上的疯狂追捧; 甚至社会中少数人的人际交往不再是以单纯的社交为目的, 其中利益关系的交织、政治裙带的参与、权色交易的隐形作祟、商品经济原则的生活准则凸显等等, 这些都是行为方式功利化的表现,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技术理性的渗透分不开。

以外卖行业为例, 技术理性的渗透使得外卖行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道德和伦理问题。在效益算法的规则下, 外卖员的平均配送时间、平均配送次数、平均接单次数等都被明确规定出来, 而相应的约束机制也被技术掌握和制定。因此, 在技术所带来的边际效益的驱使下, 为了好评和收入, 许多外卖员不惜闯红灯、逆行、抢单、违规停车等, 不仅存在很大的人身风险, 而且带来了很多交通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中国社会正从信息社会逐步走向智能社会, 技术在未来的应用一定会比现在更广泛、更复杂, 如何杜绝技术理性对人的控制, 同样是有待解决的难题。

3. 技术理性的扩张导致自我实现需求的过度现实化

马斯洛提出,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 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而在科学技术广泛运用的今天, 由于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实际效益, 反而使得自我实现的需求低俗化和功利化。一旦理性的本质被技术进步所取代, 那么控制理性便如同一句空话^[4]。产生的结果是有些技术的开发与学术创新的目的, 不再单纯是科研研究, 而是看作为名利双收的捷径。科研成果和学术作品机械地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衡量标准和衡量工具, 并在技术理性的驱动下, 求量不求质的问题浮现, 学术造假、剽窃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也随着产生;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 分歧和争端不断, 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偏见严重,

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式微,严重影响中国教育的多样性和传承性;个人价值理念在技术理性的诱导下,过分物化和现实化,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仇富思想等不良价值观念借以在社会中扩散,社会浮躁激进心态不断涌现等,这些都是自我实现需求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的歪曲表现。

原因在于,在技术理性的扩张中,它把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逐步量化成为客观的存在物,评判的标准也一步步机械化和工具化,并不断引诱人们为之进行功利主义行为和非正当行为,以达到目的,从而证明实现自我价值。同时,这种技术理性的扩张和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人的理性思考产生的束缚和消解作用,会逐步影响人的能动性,改变人的信仰,陷入信仰危机的漩涡中^[5]。单向度思维的技术理性不仅进一步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野心,还会引发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6]。而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是历史与中国人民的合力,离不开每个人的坚定信仰和能动性的发挥。因此,如何避免自我实现需求的过度现实化而引发的信仰危机,是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消解技术理性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应对措施

1. 加强制度建设,正确评估和应对技术风险

古语有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在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面前,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技术理性的傀儡。而技术理性所带来的风险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隐性问题与显性问题相交织。同时,在分析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技术理性所带来的效益远远要比风险大得多,多重因素下,导致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心态,以至于社会问题被发展的表象所掩盖。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运用,在社会遇到的问题越发突出。“技术以人为载体,伴随拥有者自生自变。”^[7]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限于人们对科技本身认识所引起的,而另一方面则是技术理性所带来的“技术风险”,缺乏对科学技术的消极后果和技术理性的渗透。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规约,人们在技术理性的指导下,科技的运用突破应有的边界,逾越了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的红线,给社会带来了难以预料的风险。面对技术异化应全面把握人文与技术的关系。因此,在治标的问题上,首先要建立对科学技术的风险和效益评估机制,正确且有效评估科学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效益,运用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预判,并进行风险预警和实施相应的对策,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强对社会机制和治理的融合,不断纠正技术理性的偏差;其次,在评估的基础上,对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管理要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和使用章程,积极构建运行有效的规则和制度体系,以更好地约束技术行为。

2. 以“道德物化”强化价值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资本主义晚期社会中,一方面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看到了技术理性借助科学技术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果——缔造了单向度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而价值理性的作用被技术理性所取代,因此,在科学技术的运用过程中,如何重新融入价值理性以抵制技术理性的泛滥,使得“道德物化”再次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道德物化”就是把道德规范“写入”技术物之中,形成一种引导人的行动的“脚本”,人们在生活中实用技术物时下意识地遵守道德规范。

“道德物化”是现代技术伦理发挥作用的一种新思路。“道

德物化”使得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调节的作用,当人们没有较高的道德和法律意识时,道德物化就可以强化价值理性在其中的作用,以抵消技术理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从而影响人们的决策和行为。

3.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现代工业社会造成了技术理性的弥漫,其过分强调“量化、操作化及概念的普遍有效性”,对于人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逐步量化为有形实体。马尔库塞曾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技术理性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技术发展的合理性逐渐消解了人们的否定性思维,成为社会控制的新形式。技术理性促进了资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自然领域中也带来了广泛影响,可以说是技术理性的发展造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全面异化,因而直接造成了社会的单向性结构。同时,马尔库塞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促使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认为运用科学发展生产力自身其实并无任何错误,错误的是将科学的逻辑运用在各个方面,更不该将“科学意识”看作“政治意识”。

中国社会因科学技术的运用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偏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将“科学意识”与社会意识形态相糅合,导致了社会的价值取向逐步偏离主旋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也存在人物化与异化的现象。而社会意识形态本身不具备纠偏的能力,再加上人们对技术理性的盲目推崇和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使得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产生了理念和行为偏差,社会共识凝聚缺位,给了技术理性很大的空间肆意蔓延。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消解技术理性的有效策略。它从不同层面面对国家、社会及个人提出的要求,是中国社会的正确价值导向,是中国精神的最佳理念阐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消解技术理性对人的消极影响的关键一步。首先,对待科技异化问题,必须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其次,科技的发展必须有人文价值的引导,避免技术使用出现消极影响。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确立正确的自我实现需求,保障人的主体性和思想性凸显。最后,在使用技术的时候要对科技发展进行积极有效地引导,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观念和自觉抵制科技的滥用,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休戚与共。

参考文献:

- [1] 温旭. 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困境与合理化出路——以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为视角[J]. 理论月刊, 2020(11):27-36.
- [2] 张鸣春. 从技术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挑战与应对[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27(02):97-102.
- [3] 吕盼.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通——关于“单向度”的生态理性审视[J]. 经济研究导刊, 2020(22):148-150+159.
- [4] 付冬丽. 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初探[J]. 公关世界, 2020(22):135-136.
- [5] 周春晓, 高金岭. 论社会治理中技术理性的张力与约束[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0(04):30-36.
- [6] 谌中和. 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技术批判思想的批判及其反思[J]. 广东社会科学, 2019(03):65-70.
- [7] 马少卿. 人工智能设计的哲学思考[D]. 华南理工大学, 2020.